

岭南作家论

黄树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岭南作家论

黄树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作家论/黄树红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6

ISBN 7-5623-1096-3

I. 岭…

II. 黄…

III. 文学评论-岭南-作家

IV. IO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路·邮码 510641)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责任编辑:黄善方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4 千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2.0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研究地域文学的论文集。

本书作者努力揭示岭南文学的发展风貌和弘扬岭南作家的创作成就。从诗歌、小说、散文到其他领域,从近代到当代、地方到部队、老一辈到新一代、著名全国到崭露头角等各类作家,作者都或微观透视、或宏观把握地抓住岭南作家创作的重要特色进行论述。不仅大致勾勒了岭南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也大体探讨了岭南文化的一些特征。广大读者会从本书中领会到地域文学研究的情趣,了解到岭南作家的创作意义,并从中加深对新文学全局发展的认识。

序

陈其光

我国幅员广大，东与西、南与北，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文学创作，均存在很大的差异。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的风格、特征和发展概况加以阐述、总结，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区文学的独到之处，而且还可以让读者从各个局部地域文学的比较中，加深对新文学全局发展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岭南文学，源远流长；岭南作家，文采风流。它正等待着评论家们去发掘、去弘扬。新年伊始，黄树红同志送来了书稿《岭南作家论》，文中所论，多与这一题旨有关。作者占教学、科研之利，穷十年之积累，对岭南文坛上一些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以独到的眼光条分缕析、归纳提炼，历时数载，爰成此书。

书稿是作者的岭南作家群研究的一个开端。从已评论的岭南作家作品看，作者为我们大致勾勒了岭南文学的一个轮廓，也大体写出了南粤文化的一些特征。首先，抓住岭南作家既坚持现实主义，又注意吸取西方文学之长这一重要特色。书稿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出发，对岭南文学的外来影响作了深刻的、辩证的论述。即使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文坛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岭南作家作品仍始终坚持现实主义这一基本潮流。广东作家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从生活出发，反映时代，从

历史的真实出发,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广采各种风格流派之长,在交流中融会贯通,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在不断的拓展创新中,没有受到社会上各种奇谈怪论的影响。不跟风,不随俗,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其次,抓住岭南作家笔下富有地方色彩描写的特色。书稿从南国社会城乡的生活风貌、性格心理、风俗人情、乡土气息以及方言谚语等方面,对岭南作家在探索民族化、群众化方面的成败得失作了肯綮的评析。再次,就岭南作家既坚持轻灵、飘逸、俊秀、潇洒的地域性风格,又朝着开放性、娱乐性发展的走向作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

书稿是一本散论。对众多的岭南作家还不可能作出系统的、全面的评价。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待加强。但它能帮助读者了解岭南作家与作品的一些特征和概貌,也是难能可贵的。作者说,这是他研究岭南作家的“一个开头”,愿他在现有的基础上,更深入持久地追下去,不断拓宽视野、扩大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有份量的岭南作家作品专论。

1996年2月20日于华南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陈其光(1)
岭南新诗的外来影响	(1)
论“中国诗坛”派的抗战诗	(14)
试论叶剑英绝句的艺术特色	(24)
“吟哦不绝,充满热情的歌者”	
——论芦荻旅澳洲诗	(35)
附:读芦荻的旅澳洲诗	(45)
论韩笑新时期山水诗的审美特色	(50)
论柯原新时期的诗	(63)
附:追求高层次的审美观照	
——读柯原新时期的诗	(74)
论叶知秋的诗	(77)
赤诚:诗情的芬芳	
——读郭光豹的诗	(87)
合着时代脉搏追寻诗美	
——论莫少云的诗	(98)
独特的南国都市风云图	
——重读《三家巷》	(106)
反映体制改革的独特视角	
——漫评陈国凯的《两情若是久长时》	(117)
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论盘老五	(121)
雷锋小说论	(132)
袁启生的通俗小说论	(151)
饶远童话小说的审美特征	(157)
大海的韵味 泥土的芳香	
——冯峥作品的乡土特色	(169)
在南北文化碰撞中成长的一代新人	
——读谭元亨的《浪漫年华》	(181)
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	(184)
试论杜埃的杂文	(194)
花城般多姿 园林般幽深	
——秦牧与杨朔的散文比较	(203)
论翁澜前的报告文学	(212)
附:建造粤海健儿的艺术画廊	
——翁澜前报告文学印象	(221)
何白涛与鲁迅	(223)
杜埃与鲁迅	(227)
明白晓畅而又别具风格	
——读林基海译著《迷惘的一生——海明威》	(234)
后记	(244)

岭南新诗的外来影响

岭南新诗的产生和成长,既有其内在规律,又有其外在因素。“外来的影响是催化剂”^①。

十九世纪末,岭南新诗孕育过程,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和日本维新思想等的影响。

我国旧诗发展到晚清,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这是诗歌本身发展规律决定的。

五岭以南,旧为瘴雨蛮烟之地。到明清年间,始外商麇集,货品山积,繁庶侈丽。如此地处偏僻又开放较早的地理环境,当使岭南文人一方面难“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较少墨守陈规;另一方面又易受外来文化影响,富有革新精神。十九世纪末,岭南许多文人已孕育了民主思想和改革精神。在创作上,接受了外来的撞击。

黄遵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早年接受了外来思想的影响,在写作上,提出了“我手写我口”^②的主张,并带头写“新派诗”。他的《今别离》:“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以旧诗的形式吟咏当时的外来的新事物轮船与火车,抒发新的思想感受。1876年,他被命为日使馆参赞赴日,成了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第一批睁开眼睛观察世界的诗人。他的不少诗(《登巴黎铁塔》等)表现了他走向世界之后特有的惊疑、喜悦。他的《为同年吴德潇寿其母夫人》,则表现他对从

比中西妇女大不相同的社会地位所感到的不安。这种把目光转向妇女地位的思想,也是受外来女权思想影响的。他的诗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比较多的外来思想影响,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受到外来诗的散文化影响,尽管他还用着五言或七言,如《冯将军军歌》、《感事》等诗,却极像散文化铺张排比的句式。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从1878年到戊戌变法,是他从一个读书人成长为维新运动领袖时期。这个时期他写了三百五十多首诗,多是政治抒情诗,抒发了一个爱国志士和社会改革家的情趣和忧愤。这些诗无疑受了维新思想影响,气象雄伟,境界开阔;自戊戌政变到1913年,是他亡命海外时期。十几年间,他游历了欧、亚、美、非四大洲的三十一个国家,写了八百六十多首诗。“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这虽是其自负之言,却多少反映出外来之声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协助进行变法理论的著作和编校工作,深受其影响。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1899年12月,由日赴美途中,写了《夏威夷游记》(最初名《汗漫录》,收入《饮冰室合集》),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说:中国的诗歌“境界”已经开辟净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后中国的诗歌要开辟新大陆,“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希望多创作具有欧洲新意境、新语句和旧风格相结合的诗。他自己就很崇拜卢梭、孟德斯鸠、拜伦等欧洲的启蒙运动领袖和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说:“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本我师。”他还翻译了拜伦的《渣阿亚》的片断和《唐璜》中的《哀希腊》章的两节,并将它们嵌入自己的著作中。他还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赞美拜伦的人品和诗品。

此外,丘逢甲,广东蕉岭县人。他的诗表现出一种走向世界

的开放意识。他在《论诗次铁庐韵》说：“米雨欧风作吟料，岂同隆古事无征？”他的《七洲洋看月放歌》更抒发了他走向世界的一时豪情。苏曼殊，广东香山县人。他明确表示他写诗以但丁和拜伦为师（见《本事师》）。他还服膺英国的雪莱。新加坡的潘受这样评论他的诗：“师梨灵骨拜伦心，驿骑中西见所吟。”^③（师梨，即雪莱）。

总之，岭南近代诗人在欧洲启蒙运动、积极浪漫主义等思潮和日本维新思想影响下，在东西方文学的碰撞中，以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冲击着传统的诗歌，无疑是岭南新诗诞生的先声。其影响之大，遍及全国。诚然，“诗界革命”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改革，由于自身的“理想宜新、形式宜旧”的矛盾，并未能取得胜利。但正如朱自清说的，“对民七（即1918年——笔者）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④

二

二十世纪初，岭南新诗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等的传播有很大关系。

1918年的全国新诗运动，是由《新青年》掀起的。这个刊物的创办人陈独秀等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思潮的影响，提出了“文学革命”，并引出一场新诗运动。在这场新诗运动中，岭南诗坛十分活跃。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者，如彭湃、郑志云、杨匏安、李国珍等人，除著文、演讲、座谈等方式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外，还利用文学等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大众接受，他们摆脱旧文学束缚，带头创作白话自由诗。1918年10月创办的《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发表了《暴风歌》等六首新诗，可说是岭南最早发表的白话自由诗。1920年创办的《工界》，1921年创办的《劳动与妇女》、《新海丰》，以及尔后创办的《少年先锋》、《广州文学》、《文学周报》等报刊，都发

表了不少白话新诗。这些新诗，不仅在形式上冲破了旧诗格律和字数的限制，而且在内容上不再拟古、复古、远离现实生活，也不再无病呻吟或吟风弄月。革命性都很强。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1917年初东渡日本求学，寻找革命真理。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1年他写了《劳动节歌》，旗帜鲜明地鼓动社会革命，宣传劳工神圣。思想上最富于革命性。艺术上是完全的白话自由体。《田仔骂田公》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写得通俗易懂，甚至采用本地方言，很适合向穷人作宣传。他的《歌一首》，简直就是运用当地山歌的形式写的。他是有意地把他的诗写成山歌一般能够唱的。这样，一丁不识的农民也可以听出其所说的内容。他的诗，由于写得浅白通俗，还能唱，因此，农民很喜欢听，很喜欢读，收到极强的效果。

杨匏安，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五四”时期南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发表在1919年《广东中华新报》上的长文《马克思主义》，就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著作，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失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丰碑。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发表，无疑对岭南新诗的诞生、尤其是在内容的革新上起着重大的影响。他自己的诗作，十来首，不多，且多是用旧体写的，如《钓》、《秋夜同无庵闲步》等，但却表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可以说，他的诗是新文学中的旧体诗。

当时，岭南的白话自由体诗中，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的比较多。其中有一首题为《呼声》的诗，这样写道：“强暴蹲在我们周围，/野心家横伏我们路上”，“他们不会向我们施恩，/我们不能向他们祈求”，“和敌人决战疆场”，“把胜利的红旗，/竖在这光明的世界上”。这些诗句直接揭露了当时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

呼喊国人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声音，就是从岭南喊出来而后震撼全国的。

诞生期的岭南新诗中，还有相当数量是歌颂革命斗争的。有一首题为《黄花冈》的诗：“如血的残阳，/照着满山红土，/松林深处，/立着新碑无数，/十年前事哪堪提？/十年后事凭谁诉？/我来凭吊一看便去了，/却交付红土残阳，朝朝暮暮！”这首诗的社会内容和革命思想都相当深刻，悼念之情也相当深沉。

总之，就思想内容言，当时的岭南新诗比全国第一本个人新诗集——《尝试集》（胡适）可说高出一筹。这是因为岭南新诗诞生期的诗作者多数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就艺术技巧言，也不会比《尝试集》差。但从整体看，则嫌概念一点，过于散文化。这除了新诗刚刚在东西方文学碰撞中诞生，难免出现生硬的“焊接”，以及在社会大变革中，无暇细敲艺术之外，大概受胡适的“明白如话”的影响也是一因。胡适并没有多少诗人气质，他写的新诗并没有什么诗味，只是把白话分行而写罢了。虽然如此，他在当时的诗坛上却影响很大。不少青年都“以适之为大帝”，“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⑤。他的《尝试集》竟成了当时一般青年歌者手中常备的读物。这种影响，在当时岭南诗坛上也避免不了。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岭南新诗的发展，受西方象征主义诗等的影响较大。

二十年代前期，西方的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在国内诗坛传播，这种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等表现主题的艺术方法，因它能够把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表现为一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也能够把现实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倍加夸张，甚至用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去寓意一些出人意

料的生活真谛，教人有充分回味思考的余地，给人带来新鲜而丰富的意境，故很能吸引青年诗人。在岭南诗人中最早接受象征主义影响，并运用象征主义创作而取得成绩的要数李金发、梁宗岱、黄药眠、冯乃超等人。

李金发，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艺术。1920年开始写诗，他说他是“受波特莱尔与魏尔伦的影响而做诗”的，而这两位诗人都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和代表，都描写孤独，表现忧郁、厌倦人生，赞美死亡。李金发学习象征派，一生写了四百多首诗，出版了三个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和一个诗文合集《异国情调》。他的诗写爱情的占了相当数量。如《使命》写一对恋人，在众人反对下，在悲剧面前，用一种傲然的态度向命运挑战。这首诗用象征主义手法写，有新意，写出了反封建的精神。虽然写爱情，也可说写人生态度，还具有哲理意味。含蓄蕴藉，颇为别致。他写的异国风情的诗，如《柏林初雪》、《幻想》、《东方人》等，也注意运用象征，让读者读之耳目一新。他的景物诗，追求自然景物的朦胧境界和神秘启示，具有一种朦胧美。他写故乡的景物，也不忘象征手法。他的《罗浮山》，就用“苍古之形的细根”，象征劳动者悲苦的挣扎。“右脚下滚的砂石”，暗喻劳动者的善良、忠厚和纯朴，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爱。朱自清十分重视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在我国诗坛上的地位。他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就选了李金发的十九首诗。就数量言，仅次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而居第四位。他称李金发是继创造社之后在诗坛上出现的“又一支异军”。朱自清之重视李金发的诗，是从它引进了一种艺术方法而言的。李金发是中国诗人中，把法国象征派诗歌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的“第一个人”^⑥，也是创作象征派诗歌的第一个人。不管人们对李金发怎么贬责，我们始终认为他毕竟为岭南乃至中国诗坛吹进一阵新风。至于李金发在引进象征派诗艺时并没有深得其精髓，甚至追

- 求世纪末的病态和唯美主义诗风,把诗写得莫测般的神秘气氛,浓雾般的朦胧色彩和消极颓废的感情倾向,则是朱自清所批评的,他的诗是“阴暗的调子和悲哀的美丽”^⑦。

梁宗岱,广东新会县人。十三岁,转读于广州培正中学时,就大量阅读惠特曼、歌德、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诗作,和波特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作。这不仅引起他对诗歌写作的兴趣,而且影响着他的诗风。梁宗岱是1921年开始发表诗歌的,到1923年去法国留学时,仅两年时间,已为新文学贡献了二百多首诗歌,成为岭南新诗坛上取得成就较大的诗人。当时就有“才华横溢的南国诗人”之称。1924年10月,他在上海出版的诗集《晚祷》,比李金发的第一个诗集《微雨》的出版早一年。这是岭南新诗的第一本个人专集。

梁宗岱的诗歌特别受瓦雷里影响。瓦雷里是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梁宗岱接受瓦雷里观点,认为诗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⑧,强调“物我一致”的境界和通感作用。他的《白莲》诗就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中描写了诗人无言独对“翠池”,看见散发出清香的白莲,却在美好的而又凄冷的月色下,“惨淡灰白”地,“悄悄地”破碎了。在幽清恬美之中,可爱的白莲破碎了。这显然是一种隐喻,暗示出诗人的心病。颜色似乎会有气味,气味似乎会有形象,这是一种通感。诗人通过美学上的“通感”作用,把白莲和诗人的形象融和契合起来了,这就更为含蓄委婉地透露出诗人当时由于生活和爱情的失意而内心凄苦之情。诗中,月色、花香、情泪交织;诗魂、月魂、花魂相融,构成意境浑然,饱含着象征意义。《散后》,象征诗人内心的悲苦。《失望》,象征诗人生活的孤独……一部《晚祷》集,就是这样以联想、隐喻、暗示等象征主义手法,即通过具体的物象来象征微妙的内心世界。既表现出对自然美的热爱,又抒发了个人的思想情绪。在这里,景就是情,情就是景,情景无分。难怪诗人说,

只有“景即是情，情即是景”，才是物我融合，浑成一体。象征之理，就是“契合”，即是物我相融，含蓄无限^⑥。梁宗岱如此崇拜瓦雷里，除了禀性、气质外，我认为，还与他“五四”后未能跟上革命潮流而心情彷徨、伤感有关。这种情绪很容易染上颓废色彩和忧郁情调的。这样一来，他的诗就自然地少了人民的情绪，代之以过分悲伤的个人情绪。这是他的诗的致命弱点。好在他的诗还比较自然，晓畅，又委婉、含蓄，开拓了新的意境，表现了新的美学追求。平心的说，梁宗岱对岭南新诗的贡献是大的。

黄药眠，广东梅县人。1921年到了广州，进广东高师英语系学习，开始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作，并开始学写新诗。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从新诗创作开始的。他早期的诗歌，由于受了英国诗歌的影响，语言有些艰涩难懂。但他接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后，变得意象丰蕴，柔婉含蓄，构思巧妙。他的《花朵》诗：“也许她坐在门前，/正洗涤着她枕上的轻罗；/昨夜的残余梦影，/都化成清浅的流波。//我的花若流到她的裙边，/她定会缀在胸前；/但她若知道我的相思深意，/会不会羞怯地把它丢在篱边？”以花象征爱情，写得含蓄有趣。克服了当时一些抒情诗一泻无余的毛病，语言也不那么艰涩了。

冯乃超，广东南海县人。早年在日本读大学时，喜欢高蹈派和象征派作品。写了不少唯美主义诗和象征主义诗，后收搜成集《红纱灯》。这些诗抒发了世纪末的颓废情调。他后期的诗则受了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的影响。

当岭南诗人多数受象征派影响之时，冯铿（广东潮州出生）却例外。她的诗主要受泰戈尔影响。她早期以写诗为主。她写抒情小诗的成就比写政治抒情诗大。她的抒情小诗，少则一行，多则四行。“五四”前后，当西方象征派诗歌传入时，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日本俳句也同时影响着我国诗坛。1923年冰心出版《繁星》和《春水》之后，许多诗人竞相试笔，很快形成了一种新

的诗歌形式。在岭南诗人中，梁宗岱也写过这种小诗，如《絮语》五十首。但没有冯铿写得多，写得出色。她的《深意》一百首，句式灵活，韵律不拘。短短几行，就写出她独特的感受，还常常闪烁着哲理火花^⑩。

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岭南新诗的成长，则多受北欧和苏俄的新的现实主义等的影响。

三十年代中期，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影响着岭南诗坛。它着重要求诗人在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反映现实；重视揭示生活的理想。早期有象征主义色彩的陈芦荻、陈残云的诗，到了中期，诗风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向着新的现实主义创作转变。

陈芦荻，广东南海县人。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曾接受了现代派诗的影响。并“写了一些表现形式和情韵都近乎现代派的诗作”^⑪。当时他在广州出版的《红豆》文艺月刊上发表的几首小诗，就多借鲜明可感的意象开掘内心世界的深处，以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微妙的情绪，带着象征朦胧的色彩。三十年代中期，当田间的《中国牧歌》，蒲风的《六月的流火》，艾青的《火把》等一股抗战的诗歌大潮冲击着岭南诗坛的时候，陈芦荻说：“我读着他们的每部诗作，真沉不住气了，也不再学秋虫蟋蟀抚节序而唧唧低吟”^⑫。他曾起誓：“不再两脚茫茫踏着黑暗……，苦难中铸炼新的信仰……”，“唱起旧时代的终曲”。这期间，他广泛涉猎外国诗歌，特别是拜伦、海涅、惠特曼等人的诗，他认为这些诗人的诗充满激情和力量，歌唱了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他在创作实践中，便学习他们的激情和力量，吸取他们的写景、叙事、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他的反映家乡农村生活的《桑野》诗，就是他在新的年代，发出的新的歌唱。诗人采用拟人化手法，赞颂